

山东缠足女性信仰生活探析

——以鲁中三镇田野调查所获手抄经卷为中心

侯 杰 赵天鹭

内容提要:对缠足女性生命历史的考察是中国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海内外学者依据历史文献采用社会性别视角对缠足女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重要成果,然而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揭示缠足女性宗教信仰生活的专题探讨尚付阙如。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和博山镇所辖部分村落田野调查所获手抄经卷的分析与研究,探讨该地区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缠足女性在维系地方信仰风俗传承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关键词:手抄经卷 “唱佛”技艺 缠足女性 信仰生活 山东

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海内外学界已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①但是,这些成果皆很少涉及缠足女性的信仰问题。以往学者只关注缠足女性的足部,并据此将其主体身份标签化,而较少关注她们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的思想和生活。截至目前,宗教研究者也没有对缠足女性这一特殊群体予以关注。笔者的研究则是将缠足女性的宗教信仰作为考察重点,突出其在信仰生活中的主体身份,阐明信仰既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揭示其主体身份的重要指标。2009年至2011年,笔者等人先后走访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和博山镇所辖部分村落,对生活在上述地区的缠足女性的信仰生活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在此过程中,一批批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友收藏的,以供其在家中和庙会上朗诵、演唱、学习和传抄的手抄经卷不断被发现。^②这些经卷是她们信仰生活的重要来源和依据,寄托着她们朴素的信仰和愿望。手抄经卷大多来自博

^① 大陆地区有关缠足的综合性著作,主要有高洪兴的《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王冬芳的《迈向近代——剪辮与放足》(辽海出版社,1997年)、徐海燕的《悠悠千载——金莲:中国的缠足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论文则有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的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载于汪安民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其中,尤以杨兴梅发表的文章居多,如《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从劝导到禁罚:清季四川反缠足努力述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民国防区制时代四川的反缠足努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政权与妇女组织配合下的中共根据地反缠足运动(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境外研究方面,美国学者高彦颐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较为引人关注。

^② 本文所涉经卷为土门镇左家峪村孟庆英、丁念玲,土门镇刘家洞村某村民,池上镇下郝峪村袁兆翠,以及博山镇北博山村谢嘉英所藏,在此谨向经卷的使用者和收藏者表示感谢。

山镇辰巳山及周边地区,辰巳山庙会期间各地香客互相学习、抄录而来的副本。它们文字浅白,篇幅长短不一,多为七言或“十字攒”(三三四句式)韵文,易于记诵,通俗易懂,且皆可搭配一定曲调在庙会仪式上演唱。^①这些经卷的形成年代不详,最初似乎是由当地宗教人士及男女两性普通民众传抄,并在庙会及仪式上使用,寄寓其宗教信仰和愿望。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焚毁,现再度流传。

部分手抄经卷在内容、形式上与宝卷存在着某种渊源、联系,而“唱佛”技艺似乎是由“山东宣卷”发展而来的。根据郭学东与车锡伦的研究^②，“山东宣卷”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最初的文本就是宝卷,曲调则是较古老的民间曲牌。近代以降,无论是演唱文本、演唱仪式,还是演唱者的身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庙会活动所唱经卷,呈现出篇幅短小、语言古今杂陈、宗教性较弱而娱乐性较强的形态。淄博周边地区“唱佛”所用的曲调,似乎仍是古老的民间俗曲曲牌,如《凤阳歌》、《耍孩儿》、《放风筝》、《打枣杆》、《叠断桥》、《银纽丝》以及黄梅调等。这些手抄经卷现多为该地区缠足女性持有与使用,对探究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 祈福禳灾:手抄经卷的重要主题

笔者收集到的手抄经卷,在结构、篇幅与主要内容等方面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是其重要主题——“祈福禳灾”却又大同小异。经文中不乏缠足女性对现世人生幸福的真切期盼,对各种灾难的畏惧和禳解。《十拜香》^③是一部香客参与庙会酬神仪式时所演唱的经文,即展现了被缠足女性赋予“祈福禳灾”职能的神佛体系。这部经文的起源较早,如在明代《护国佑民伏魔宝卷》^④中就有类似的文字。经文主体部分是对多位神明的跪拜上香,礼拜燃灯佛祖、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四海龙王、无生老母、碧霞元君、北斗、城隍、菩萨以及灶王等来自佛、道以及民间信仰的神祇。

一柱香,我拜的,兰增〔燃灯〕佛祖。
二柱香,我拜的,天地玉皇。
三柱香,我拜的,三观大地〔三官大帝〕。
四柱香,我拜的,四海龙王。
五柱香,我拜的,五生老母〔无生老母〕。
六柱香,我拜的,泰山老母娘。
七柱香,我拜的,七星北斗。
八柱香,我拜的,本县城皇〔城隍〕。
九柱香,我拜的,当庄菩萨。
十柱香,我拜的,宅神灶王。
十拜香,拜完备,参拜神灵。又增福,又增寿,免去灾殃。弥陀佛。

经文末尾道出了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普通民众拜神进香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增福寿,免灾

① 当地民众称之为“唱佛”。

② 郭学东关于“宣卷”的研究,参见李群主编:《曲艺》,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第399~404页;车锡伦:《山东的宣卷》,《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第259~263页。

③ 经卷提供者:刘家洞村某村民;获取时间:2009年8月17日;获取地点:刘家洞村该村民家中;获取人:侯杰、傅懿、赵天鹭。

④ [明]悟空撰:《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上》,张希舜、濮文起等主编:《宝卷·初集》第5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2~209页。

殃”的世俗需求。而这种将诸多神明一一赞颂的方式,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实用功利的宗教情怀。这些神明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的神力,可以保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各项基本需求。在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中国民众看来,“神越多,神力就越大,那么所得到的恩惠也就更多,因此,为了达到某种愿望,他们会拜倒在群神脚下”^①。

对生命健康的渴求与祈望,在这些经卷中屡见不鲜。淄博地区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民众将观音菩萨、吕洞宾和极具地方特色的“石大夫”等奉为“医神”,虔诚崇拜。石大夫崇拜是流传于鲁中山区的一种独特的信仰。叶涛等学者认为,石大夫信仰属于灵石崇拜的变异形态,与泰山石敢当似乎有些许渊源,“在现今山东淄博南部、济南东部和泰安、莱芜一带,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石大夫信仰”^②。据孙金奉的考证,清中叶后,石大夫开始与“十大夫”、“十大名医”等名号相混同。^③淄博地区的石大夫信仰与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在池上镇八宝灵山寺内有“十大夫殿”,辰巳山上亦有“十大名医”殿。^④一些缠足女性有过向石大夫祈求消除自己脚痛的经历。^⑤笔者收集的手抄经卷中,虽然尚未发现单独赞颂石大夫的文本,但是相关内容散见于观音菩萨和吕洞宾的经卷之中,其身份也多是二者的“助手”,名号也多称为“石陀佛爷爷”、“十大名医”等。如经文《无病无灾》^⑥有言:“观音老母下天台,随手就把柳瓶带。石陀佛爷爷他指点,查看弟子有无灾。”又如《打茶记》^⑦所载:“关〔观〕音老母有善心,待下药来打〔搭〕救人。有病就请老母看,吃药就请吕洞宾。十大名医挑药引,三杯清茶鲜又鲜……弟子吃了仙丹药,身离床,病离身,多年疾病去了根。”

手抄经卷对生命健康话题的格外关注,似乎与当地历史上较为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有关。如在博山镇的九龙山上,有年代久远的药王庙、吕祖殿与诚感亭。诚感亭供奉的“福神”,据传是一位隐居博山、熟谙医理的先人。据1936年《九龙山重修庙碑记》载,“福神仙师”为明代甲辰进士,原籍湖北。其人“早岁频惊宦海”,世乱隐居此地,深明医理。“村中无医……无论男女老幼,一有疾病,惟依仙师……遇时疫则求方者昼夜无停。”^⑧庇佑一方有功,其死后被尊为“福神”。正是由于乡村民众的生命健康在历史上长期没有保证,因而以医神崇拜与驱病免灾为主题的经卷才会广为流传。

除却对美满人生的期许,不少手抄经卷还特别强调、重视“孝道”。如“为人不把娘恩报,吃斋念佛是枉然”,“在家孝顺父和母,强起远路去烧香”^⑨等等。这与该地区盛传的“孝文化”不无关联。在淄博地区流传的“孝文化”中,最著名的当推“孝妇”颜文姜。据刘心明考证,有关颜文姜的文字记载首次出现于晋代郭缘生所著《续述征记》,但只称其为齐地孝妇,未有确切名号。至唐代李元的《独异志》,开始出现“颜文姜”的名号及其侍奉婆婆的事迹。直至北宋宣和七年(1125)陈琦撰《续翁婆因地记》时,才明确提出颜文姜为“复圣”颜回的后代,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⑩

当下,颜文姜已从帝制时代宣扬“孝道”的地方先贤转变为护佑一方的全能神。“人们相信一个

① 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9~140页。

② 叶涛、刘晓:《泰莱山区石大夫信仰考察》,《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③ 孙金奉:《石大夫新考——以鲁中山区为例》,《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 据笔者观察,这些庙宇所供奉的神像皆只有一尊,可见“十”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⑤ 被调查者:李景凤(时年86岁,池上镇陡沟村村民);调查时间:2010年8月6日;调查地点:李景凤家中;调查者:张培培、鲍朝阳。

⑥ 经卷提供者:刘家洞村某村民。

⑦ 同上。

⑧ 《九龙山重修庙碑记》。采集时间:2011年8月8日;采集地点:九龙山景区;采集者:秦方、赵天鹭、张培培、王蔷薇、张美珊、苑博、郑楠。

⑨ 《血盆经》。经卷提供者:孟庆英;获取时间:2009年8月19日;获取地点:左家峪村孟庆英家中;获取人:赵天鹭、王来忠、李娜、傅懿。

⑩ 刘心明:《博山孝妇故事探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道德高尚、有卓越才干的人死后会成为无所不能、创造各种奇迹的神灵。”^①在众多生动的本土叙事中,颜文姜最终被塑造为一个年轻而不幸的寡妇,短暂而充满悲剧色彩的婚姻,心肠恶毒的婆婆,以及常人难以忍受的家务劳动。但其长久的孝行又成了得道的契机,无论是太白金星赐予神物、解救婆家人于洪水中的“坐化成神”,还是成神后化身老妇帮助东征的李世民、与碧霞元君的义姐妹之情等,都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颜文姜信仰流传的主要地区,是位于山头镇的颜文姜祠以及传说中她的“娘家”八陡镇附近。农历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七月初三日为颜文姜庙会会期,尤以七月初三的寿诞日最为兴盛。此外,在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或三十)日晚,颜文姜娘家、舅家等亲戚所在的村落,即八陡镇的阁子前村、青石关村、岳庄村、石炭坞村等十余村的民众有组织地抬着花轿,挥舞着彩旗,手提红灯笼,举着黄罗伞以及各村村名横幅和标志,自傍晚五点至深夜十二点前后,成群结队地先后来接颜文姜“回娘家”。一个月后,即农历六月二十九(或三十)日晚,再将颜文姜送回颜文姜祠(婆家)。^②

颜文姜祠,又名灵泉庙、顺德夫人祠,俗称大庙,位于博山凤凰山南麓,山头镇北神头村,共有正殿(颜文姜殿)、寝殿(卧奶奶殿)、配祠、两庑、香亭等殿房83间,主体建筑34间,占地约3660平方米。据乾隆《博山县志》载,颜文姜祠“后周时建,唐天宝年间重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颜文姜被敕封为“顺德夫人”并“赐灵泉庙为额”,元代又被封为“卫国夫人”。经历代扩建重修,现存殿宇皆为明清时代的建筑。^③此外,博山地区还曾有颜文姜的“四大行宫”,即石马镇桥东村的石马顺德圣君祠、源泉镇泉河头村的龙湾顺德夫人行祠、博山镇盆泉村的盆泉顺德夫人行祠和池上镇东池村的池上顺德夫人行祠。“行宫”众多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颜文姜在博山地区的特殊地位。

在手抄经卷中,有一部《给顺德母做寿诞》^④,便是民众参与七月初三日颜文姜庙会时所演唱的经文:“顺德圣母好良善,孝敬父母你为先。七月初三生旦日,名禅宝贝献佛前。”需要指出的是,经文对颜文姜“孝行”的称赞,仍然以关怀现世人生的幸福安康为旨归。孝敬父母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可以得到神明馈赠的善行,所有恪守孝道的人均能够获得同样孝顺的子孙后代。“阳间为人孝父母,孝敬父母感动天。孝顺生下孝顺子,孝子贤孙辈辈泰。”又如《泰山佛》^⑤这部经文,在祈求碧霞元君^⑥赠予子女的部分,也特别强调子女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职责:“你的怀中缺一男,差着童子去下凡。你的床前缺一女,差着花姐去落凡。花姐童子下了凡,孝儿孝女在眼前。人老孤夫有人管,一对儿女在眼前。”总之,经文中所呈现的朴素的孝道伦理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它寄托着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老年村民对晚年生活美满的期待和向往。

二 沿袭与创造:信仰世界的“新陈代谢”

在笔者收集的部分手抄经卷中,留有大量明清以来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遗存,其中尤以无生老母信仰为多。依据郑志明的研究,无生老母信仰可以追溯至明代无为教祖师罗祖创立的经典“五部

①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② 陈杰:《颜文姜庙会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页。

③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吴守论编著:《孝水古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48页;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办事处编:《淄博风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④ 经卷提供者:谢嘉英。

⑤ 经卷提供者:孟庆英、刘家洞村某村民、谢嘉英。

⑥ 当地民众称之为“泰山奶奶”。

六册”及无为教教派时期。^①无生老母是彼岸极乐世界的最高神灵,她孕育了人类并与自己的儿女无忧无虑地生活。人类被老母派往东土后,经历了种种劫难,无生老母遂派使者下凡,“发灵符,救度人民”,与老母团聚真空家乡,“相伴无生”,“永不下世”。^②在山东,历史上曾有多多个不同的民间秘密教派组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如八卦教、一贯道和皈一道等。“山东的民间宗教……其教义也多是杂抄各家的某些经典,并无自己像样的思想体系。”^③在众多描绘无生老母事迹的经卷中,其形象亦是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的样貌。

《开老母门》^④一文,重点展现的是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想象。龙华会上,无生老母“打查对号”^⑤,虔诚的弟子经受了老母的查验,如愿地脱离了东土之地。在这部经文中,无生老母宛若一位慈爱的母亲。“龙华会上一会人,叫老母你开门,老母问俺什么人,俺是山东是善人(原文如此)……老母听说喜心怀,哗啦就把门来开……弟子听说喜盈盈,双腿跪在地流平(原文如此),拜拜母娘理当应,老母听说喜心怀,两手拉起婴儿来。”随后,通过试炼的“弟子”开始在其他神明的带领下,游览极乐世界,梳洗、更衣、向无生老母请安,开始了新的生活:“吃仙果,喝仙茶,陪伴老母永世不会〔回〕东。”

而《无生老母查号》^⑥则是一部劝人生前“念佛行善”的经文,展现了对阴间地狱的恐怖想象。作为民间宗教供奉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不仅具备下界度人的神性,亦可审判、惩罚生前不做善事之人:“无生母,在高山,自嗟自叹。叹众生,迷了路,忘却家缘……你只说,在阳间,见人受罪。未见那,阴间里,抗枷带环。”经文借助流落阴间的魂灵的所见所闻,揭示出统治地府的神明是由无生老母、阎王、鬼使三个不同的等级组成:“不多时,又来到,闫君面前。往上看,端坐着,无生老母。往下看,众鬼使,各执钢鞭。”经文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对无生老母审判的描绘。有功人平安无恙,而无功者则被施以严厉的惩罚:“老母问,在阳间,作何生理。凭着啥,来见我,诉说一番。有功的,双膝跪,答查对号。众鬼使,打下躬,尊敬如山。无功人,见有功,答查对号。只吓的,战兢兢,不敢进前。有老母,忙吩咐,答查对号。又推聋,又装哑,又不做声。无生母,只气的,满面飞红。忙分〔吩〕咐,拉下去,填了火坑。无功人,只吓的,泪流满面。众鬼使,拉下去,丢在一边。”

手抄经卷沿袭了民间秘密宗教对无生老母的尊崇。然而,这似乎也仅仅是文字层面上的遗忘了。由于民间秘密宗教在历史上屡遭镇压与取缔,无生老母的庙宇也多被摧毁,存留极少。“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些偏僻的山区佛道建筑里,偶尔会有无生老母的像,不过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意义。”^⑦据辰巳山看庙人马芬英回忆,山上曾有一座无生老母庙,主神为无生老母,无像,仅有牌位。该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摧毁,至今尚未修复。老人难以说清无生老母的神性,仅从山上的手抄经卷中了解到她是一位女神。^⑧因此,尽管无生老母在手抄经卷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已与时下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相去甚远。

① 郑志明:《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② 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9、173、345页。

③ 《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二十一册“卷二十一·宗教志”,山东文献杂志社(台北),2002年,第2133页。

④ 经卷提供者:孟庆英。

⑤ 在淄博地区的民间信仰仪式中,民众前往庙宇进香时,有时会将自已及家人的名姓与诉求写在红色或黄色的长方布条上,放到所要祭拜的神灵的神像旁,让其“知晓”自己的身份与诉求,以表虔诚,当地人称之为“表明挂号”。而“打查对号”即是对神灵收到“挂号”并查验进香者是否有过虔诚信仰行为的一种情境想象。

⑥ 经卷提供者:孟庆英、袁兆翠。

⑦ 孔庆茂:《民间宗教的创世女神——无生老母》,《文史知识》2008年第3期。

⑧ 调查时间:2011年8月10日;调查地点:辰巳山景区;调查者:侯杰、秦方、赵天鹭、张培培、王蔷薇、张美珊、苑博、郑楠。

信仰因人而充满活力,变得丰富多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淄博地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其信仰生活中也加入了诸多新元素,一批颇具现代气息的手抄经卷应运而生。如《人财两旺》^①这部经文,大部分篇幅用来陈述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人群“念佛”的好处,在祈求身心健康之余,还特别提出了对财富的渴求:“老人念佛心舒畅,身心康乐体强壮。青年烧香百事顺,青年念佛财更旺。”而文中“出门在外天天顺,人车平安发大财”、“种棚养殖办工厂,日进斗金赛银行”、“学生烧香考状元,名牌大学来提俺”等词句,似乎也意味着此经的最终生成年代很难超过30年前。

不仅如此,当地民众还依据现实需要创造出了“与时俱进”的神明崇拜及其专属经卷。在沂源地区发现的关于路神、车神信仰的经文即是一例。摩托车与汽车走进沂源县的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②机动车在当地多由从事客货运输工作的司机所用,此项工作意味着丰厚的报酬,以及行走乡村山路的风险。路神、车神信仰既是当地民众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增加神灵信仰的一个缩影,也承载着缠足女性对家人出门行车一切平安的祈望。

据说,“汉朝以先,并没有路神的名目”^③。中国的路神崇拜可追溯至汉代,其中一种说法是路神即为共工之子。据《风俗通义·祀典》载:“谨案《礼传》:‘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为祖神。’祖者,俎也。”^④在沂源地区,路神崇拜似乎有传统可循。当地民众春节第一次出门时要在村头路边放一挂鞭炮,名为“祭路神”。车神崇拜则是当代新兴的信仰风俗,随着机动车逐渐增多,开始有人在新车前上供、化纸钱、上香,名为“祭车神”。新车第一次上路,春节后第一次出车,以及麦收后敬天都要祭车神与路神,并将祭祀过的红布条系在汽车或摩托车的后视镜下。^⑤笔者曾在下土门河北村发现一件“平安文疏”,即是当地车主在出行前敬献各路神明祭品(平安包袱^⑥)的文字凭证:

具文疏人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下土门河北村善男齐元福车主 为保鲁 C 五八一〇八牌号长铃摩托 100 远出近行的出入平安 行驶安全 择良辰吉日愿敬献于
玉皇大帝 案前平安包袱一对 以表心意 永保平安
泰山奶奶 案前平安包袱一对 以表心意 永保平安
观音奶奶 案前平安包袱一对 以表心意 永保平安
空中老母 案前平安包袱一对 以表心意 永保平安
地堂老母 案前平安包袱一对 以表心意 永保平安
看车老君 案前平安包袱一对 以表心意 永保平安
六位众驾神灵 各显神通 各负其责 自今往后 多多保佑他远出近行 搞运输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各位司机行驶平稳安全 畅通无阻 鹏程万里 生意兴隆 财源茂盛 兴旺发达 一切
一切顺心如意 感得无极矣
空口无凭 特立黄表文疏为证
上闻

① 经卷提供者:丁念玲;获取时间:2009年8月23日;获取地点:左家峪村小卖部;获取人:侯杰、王来忠、赵天鹭。

② 详见沂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沂源民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③ 李干忱编纂:《破除迷信全书》卷十“多神”,美以美会全国书报部(上海),1924年,第563页。此外,该书提及路神亦有黄帝之子的说法。

④ [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页。

⑤ 沂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沂源民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⑥ 在当地,“包袱”是一种在敬神祈福仪式上常见的祭品,纸质,多为四方形,上缀彩色纸花。“平安文疏”通常粘贴于“包袱”的纸花之下,用以向神灵表明敬献者的身份。

公元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叩献^①

这部“平安文疏”罗列了六种神祇，最末的“看车老君”似乎即是当地车神的名号。然而，若以笔者调查所获得的手抄经卷^②相对照，沂源地区的路神、车神名称及其内涵等十分混杂无序，尽管他们有着相近的神格。

路神、车神信仰经卷的创作年代应当距今不远。由于是新近创造出来的神祇，经卷中所呈现的路神、车神的名号较为混乱，计有“车头老爷”、“四路老母”、“四大路神”、“路神老爷”等，而上述神明有时还与福神、财神、菩萨、八大金刚具有共同或相似的神性。手抄经卷中关于路神、车神的描绘虽是含混而不成体系的，但保佑出行安全与增福、发财的神职、神能却十分明确。如经文《车路经》所言：“开车的司机要上供，金银财宝望〔往〕上升……增福财神拉到家，幸福日子大发家。”与之相对，《路神老爷喜盈盈》以老年人的口吻写成，将祈祷的重点放在了出行安全上面：“路神老爷喜盈盈，儿女出门你照应。大路走，小路行，一路走得很太平……天为阳，地为阴，儿女出门有护身……保得儿女无灾难，无灾无难回庄村。”父母对出门在外的儿女的关怀与牵挂之情跃然纸上。

三 “行好”：缠足女性的理解与贡献

该地区手抄经卷的持有、使用者多为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现年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群体。那么，她们对自己的信仰有着怎样的认识，对手中的经卷又有怎样的理解呢？当笔者对孟庆英进行专访的时候，曾请她详细讲解经文的内容。然而，她仅仅是变换着不同的曲调，为笔者一行人演唱经文而已。或许，她将所谓的“讲经”与“唱佛”技艺等同起来了。至于信仰的归属问题，孟庆英则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信佛”的人。

问：奶奶，您信什么教？

答：信佛，别的不信。我还不信神，我就是信佛。早上四五点钟起来，烧上一炷香，念一炷香的。^③

孟庆英也许是当地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了，但这里的“佛”并不专指佛教，而是她对自己多神信仰体系的一个命名。根据李英爱的说法，她是“懂”那些经文的。至于参加宗教活动的动机，她说是为了“行好”。

问：您为什么去拜神？

答：不就是为了行好，渴望咱好啊！你看渴望咱中国太平，多么好。又〈渴望〉什么灾也摊不着，又〈渴望〉平稳世界，不就是为了这些拜吗。

问：您为什么参加庙会？

^① 文献提供者：齐元福；采集时间：2009年8月21日；采集地点：土门镇下土门河北村；采集者：侯杰、傅懿、李娜、王来忠。

^② 关于路神、车神信仰的经卷，主要有《路神老爷喜盈盈》、《车头老爷》、《车路经》、《摩托车》四部。经卷提供者：刘家洞村某村民（《车头老爷》、《车路经》）、丁念玲（《路神老爷喜盈盈》、《摩托车》）。

^③ 调查时间：2009年8月19日；调查地点：孟庆英家中；调查者：赵天鹭、王来忠、李娜、傅懿。

答:行好啊……以后的时候,人来接了去。^①

老人所言“行好”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现世幸福生活的渴望,这既包括对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幸福之追求,也涵盖了对国家、世界平安和谐的向往;一是对自身死后归宿圆满的祈祷。这或许可以说明她是了解部分经文内容所包含的意义的,因为一些劝诫性较强的经文关注的正是人类死后的归宿问题。因此,该地区当下仍具备“唱佛”技艺的缠足女性,对经文的理解大体上是基于字面意义的简单而初步的理解。然而,“唱佛”活动本身所承载的宗教情感,或许比经文的内容更为重要:它是进香者与神灵进行沟通的更为虔诚而直接的方式之一,也是民众内心吉祥意愿的祈求方法和表达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唱佛”所关注的受益群体,以许愿者本人及其家人为重心,逐渐向外扩散。在“唱佛”仪式中,人们会祈求各类神灵能够保佑自己和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任何人与事物,以使自己能够得到真正美满幸福的生活。^②

该地区的“唱佛”技艺有着较为清晰的传承模式,但在当下也暗含着某些危机。“唱佛”技艺长期由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中老年女性所掌握、传承。据李英爱回忆,她的“唱佛”技艺就是十六七岁时在家乡和已掌握该项技能的女性长者学会的,传授方式是简单的一对一口耳相传。笔者调查这一区域的部分缠足老人,是至今仍健在的老一辈“唱佛”技艺的传承者。她们大多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缺乏基本的识文断字能力。于是这种大多流传于女性之间的传统技艺便只能依赖个人的记诵能力,需要长期不断地训练才能学成。随着当地缠足女性年岁渐高,一些掌握此项技艺的老人相继过世,而健在的老人又面临着疾病和记忆力衰退等问题。缠足或许并未完全妨碍她们外出参与各类宗教活动,但传统的技艺传承模式却使得成为一名熟练的吟唱者变得十分困难。

较早成文的经卷在此前过激的宗教政策下悉数毁灭。在当代,以庙会为交流平台的手抄经卷与“唱佛”技艺的传承方式悄然兴起。然而较为年轻的中老年女性群体仍然识字率偏低,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成文经卷的使用效果。“唱佛”技艺的传承仍然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记诵模式,孟庆英、李英爱等人仍在亲自向年轻人传授技艺。遗憾的是,时下愿意学习此种技艺的人不仅数量十分有限,且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照老人们的设想做到大量熟练背诵。可见,流传于该地区的“唱佛”技艺,前景不甚乐观,存在后继无人的隐患,未来实难预测。

结语

淄博地区的手抄经卷为我们呈现出缠足女性的信仰生活与欲求,但是其主题大多集中于普通民众对现世人生问题的关注上。广大民众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丰富、补充乃至更新着自己的信仰体系,淘汰旧神,创立新神,进行着信仰生活领域的“新陈代谢”。而沂源地区以路神、车神崇拜为代表的新兴信仰的涌现,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民间信仰自身强大的生命力与开放性特质。

由于这些经卷的持有、使用者多是包括缠足女性在内的中老年女性群体,经卷所传达的世俗需求与情感关怀也具有较为明显的身份特征。经卷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美满、家中晚辈的平安幸福,以及死后彼岸世界的安排都倾注了较多的关心。而这一现象也许并非偶然,似乎是中老年女性群体

^① 调查时间:2010年8月2日、2011年1月26日;调查地点:李英爱家中;调查者:侯杰、张培培、赵天鹭、鲍朝阳、贾敏。

^② 张玉:《唱佛——庙会中民众吉祥愿望的集中表达——以沂源县织女洞庙会为例》,《中华吉祥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民俗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162~164页。

在传承经卷的过程中有意为之的结果。缠足女性是当地“唱佛”技艺的传承者、地方信仰风俗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在年复一年的朝山进香、传经授曲中,她们将自身接受的信仰和创造的文化传播给了周围的年轻人。

手抄经卷最初由当地男女两性共同创造、使用,也使得经卷在反映缠足女性信仰生活与内心诉求的同时,也反映着当地普通民众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缠足女性与当地民众共同拥有并分享着许多相同、相近的信仰风俗。由于材料的限制,该地区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天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Survey on Religious Faith of Foot-binding Women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Materials of the Manuscript Scriptures
from Three Towns in the Middle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

Hou Jie Zhao Tianlu

Abstract: The study of foot-binding wome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ocial gender. Nowadays, although the researches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 foot-binding women,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ocial gender sight, have some achievements, articles are still scarce which apply the ways of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to reveal the topic of their religious lif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manuscript scriptures found through the field trip in the villages of Tumen town (in Yiyuan County), Chishang town and Boshan town (both in Boshan District) in Zib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Since we have received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materials which were widely used by the foot-binding women in their daily religious faith, we can not only explore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religious life, but can figure out the exertion and contribution which the foot-binding women have made in keeping and inheriting the local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Key Words: Manuscript Scriptures; the Art of Chant (Chang-fo); Foot-binding Women; Religious Faith; Shandong Province